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拥有世界最多农民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实现现代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农业、农村和农民（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现代化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19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证明，农村的兴衰治乱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必然带来国家的兴盛与安宁，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①农民革命构成了20世纪世界发展的主题，中国也不例外。进入21世纪，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三农”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反而在某些领域进一步恶化。“三农”问题的妥善解决与否，不但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事关国家的安全稳定。研究农村问题，必须把农业、农村和农民当做一个整体，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如何突破“三农”问题发展的瓶颈，使政治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推进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任务。

一、选题意义

中国学术界历来有一项优良的学术传统，就是“学以致用”。任何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并且要回到实践中去的。选择任何一个学术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都必须要有问题意识，着眼于当前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的、迫切的、亟待解决的难点、热点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找到新的解决方法，以

^① 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研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资本问题无疑符合这一学术传统，对解决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来讲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实践意义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唐朝诗人李绅这两首广为传颂、耳熟能详的诗反映了封建社会最广大基层群众——农民的勤劳而又悲惨的生活。作为社会的最底层，封建社会的农民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自然灾害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交相并存，使他们常常陷于破产的境地。当农民忍无可忍的时候，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构成了封建王朝更替的主导力量。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发挥了革命主力军的作用。“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这样，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①“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②正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以牢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最终中国共产党才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为中华民族的独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立和富强打下牢固的根基。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并给予共产党革命路线以高度评价，美国学者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书中写道：“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①

1949年，在全国解放前夕，当全党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时，毛泽东就谆谆告诫全党：“决不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②建国后，他又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③但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重工轻农”“城乡分治，一国两策”^④的实施，使农村与城市差距越拉越大。

1979年改革开放，农村首当其冲。邓小平说：“对内经济搞活，我们首先从农村入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⑤“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统分结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实施，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民成为改革之初的最大受益者。1987年，在农村实施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以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为主要目标的村民自治制度，使中国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农民收入持续下降，村民自治举步维艰，农业增长后劲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当前中国整个社会持续、协调、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如何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和谐，是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理论难题，也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旨趣所在。提升农村社会资本，无疑可为解决当前农村经济社会难题，破解治理困境提供一个新思路。

① 龚忠武：《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引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首先,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学者通过大量经验研究证明,缺乏团结能力与贫穷之间存在重大联系。农民之间集体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的缺失,无疑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社会资本能够解决集体合作的困境,促进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合作,降低经济发展中的交易成本,促进信息流动,提高成员信任度,进而提升整体经济的发展效益。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就将社会资本的欠缺(缺乏社会团结能力)看做是比经济资本(贫穷)更重要的制约经济发展的命题。

其次,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指在利益多元化的基础上,社会群体之间的团结和合作。社会资本拥有的、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互利、互惠规范,能够促使成员对自身所属的团体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投入,遵守群体规则,自觉履行义务,并且对违反规范者给予惩罚。充裕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在社会资本均衡分配的地方,能够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协商、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避免矛盾的冲突和激化。

再次,社会资本有利于政治稳定。社会资本成为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所缺乏的东西,反过来,社会资本匮乏又能解决农民的不利地位。即使有些农村地区居民相互之间不乏有机联系,但是这种弱者之间的具有高度同质性的联系,使他们长期疏离于“主流”社会网络之外,在此意义上讲,不是有些农村缺乏社会资本,而是社会资本的软弱和低下,使他们难以从社会主流网络中获取资源和机会。

贫困、歧视和不平等构成当前抑制农村社会资本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抵消了其有限的社会资本带来的积极影响。在社会资本不均衡分配的地方,社会网络通常是腐败的、裙带关系的,并能引发大量寻租行为。某些与政府接近的内部集团能够获得公共产品的最大份额,垄断信息和机会,通过内部交易使小集团收益,而使大众受损。而且这一切单凭市场机制调节难以实现公平,需要国家加大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民主就是一种利益调节分配机制,而且是一种和平的利益调节分配机制。然而,单纯依靠民主制度,并不能自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和社会资本的完善相伴而行,缺一不可。

社会资本既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

响,能够做到以人为本,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树立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参与技能,增强互助、互惠合作水平,实现社会的民主公平正义,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对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严肃的政治、社会问题。改变法律和制度影响社会资本外在环境和社会结构,要求政府率先做出表率,并积极引导农村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努力,实现社会资本的均衡发展。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政府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政府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政府创新是社会创新的表率,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有一个创新型的政府。”^①同时,现代政府统治必须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充分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塑造农村的公共道德成为支撑社会资本良性运转的关键要素。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保障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外,诸如信任之类的社会资本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政府和民主制度要成为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社会资本这个润滑剂同样不可或缺。如果说制度是一个‘硬件’,那么社会资本就是‘软件’,两者缺一不可,也不可互相替代。”^②

(二) 理论意义

社会资本本身是个充满争议、又充满魅力的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引入中国以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运用于各个领域。在中国,农民学作为“显学”的背景下,社会资本不可避免地被学者拿来用作分析中国农村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和难题的工具。

社会资本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制度。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生成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具体遗产,同时在特定时空里形成的制度越强大,对于社会变迁的阻滞性越强。尽管对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是学者们都注意到,“三农”问题的突出,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传统农业大国逐步迈向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正如徐勇所指出的,在中国长期农业文明历史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存在,却没有所谓的

① 俞可平:《建设一个创新型政府》,《人民论坛》,2006年第9期,第4页。

② 马得勇:《东亚地区社会资本研究·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得以成为一个问题，深刻的根源是现代化进程。”^① 不是说传统社会不重视农业，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所需的粮食和其他原材料，任何一个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根基、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得重视农业，“无农不稳”，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战国时期的秦国已经把“耕战”作为基本国策，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士农工商”，以农为本。但是封建统治者只是把农民当做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富民、强民、安民的目的在于愚民、防民。因此在封建统治时期，为了节省统治成本以维护封建统治，封建统治者往往把农民孤立隔绝在各自的土地上，就如马克思所言：“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联系，形成政治组织。”^② 因而，传统自给自足生产模式下，中国人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是“家”，而不是“国”，所以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③ 中国农民的一盘散沙，缺乏先进意识和理论的指导，彼此间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直接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失败，即使成功也是被当做改朝换代的工具，结果只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而且还是一个由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以部族为基础的地方性社会走向相互联系的整体，构建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同时，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持续运转的、合法垄断暴力政治性组织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取得人民的认同和同意，也就是面临合法性的挑战。现代国家必然产生权力的归属、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的问题，如杜赞奇所说：“国家权力在现代的扩展涉及一个双面的过程：一是渗透与扩张的过程；二是证明此种渗透与扩张过程的

① 徐勇：《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理论月刊》，2004年第9期，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7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第2页。

合法性。”^① 与传统统治下“天授神权”相对应，现代化国家都确立了“主权在民”的统治体系，因此徐勇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构建过程。^② 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要求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地方的、宗族的权威集中于全国、单一的、世俗的权威，制定有效的追赶战略，集中优势资源，最大强度动员国内力量，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自上而下的推进现代化进程。因此，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特别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号称“四小龙”的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现代化取得的成就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引导和推动下取得的。强势政府既能推进国家统一，维护国家主权，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在民主和法治等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权力拥有者和财富占有者天然结成同盟，公共权力的异化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导致社会冲突的频发。

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无疑属于易受伤害的弱势群体。现代国家建构主要针对的地域是农村，主要改造的对象是农民。那么，如何在现实社会中体现农民在农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农民间互助合作，对政府权力滥用进行有效的遏制，对农民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质量、类型、功能、作用进行分析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尽管社会资本理论体系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基本概念还存在一些争论和分歧，也有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提出了有根据的、中肯的批评，但是大多数学者同意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的说法：“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是可以进行严格界定的。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应当取代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成为社会科学中极具价值的核心概念。”^③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合作、人际互惠，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现代化背景下，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创造、消弱、破坏、强化或者转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书将对以下部分内容进行理论的探讨与分析。

① [美]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② 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第19页。

③ [美]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T·K·安：《社会资本的含义及其与集体行动的联系》，载周红云主编：《社会资本与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

首先,传统与现代社会资本的关系。在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中,一般把传统和现代划分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划分方法遭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社会资本影响发展过程,但是同时受到发展过程的影响。帕特南的研究也指出,社会资本要以社会历史和环境为基础。农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根据美国学者威廉·奥格本的“文化滞后论”^①,农村传统的风俗道德和价值观念仍对当今农民的生产生活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研究农村社会资本,必须立足传统。传统与现代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隔阂或对立,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的依赖或联系。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农村传统与现代社会资本的协调是本课题所要关心的重要问题。

其次,社会资本生产中的公共角色。在中国提到公共角色,一般人第一反应就是政府。奥斯特罗姆认为,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政府机构对于个人用来追求长期发展努力地社会资本类型和水平有重要影响。^② 群体是个体的集合,当然政府机构的法律和制度对于具有相似境遇、联合起来的群体组织追求的社会资本类型也重要影响。但是,政府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包揽一切的政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如果政府足够强大,能够打破现存的地方合作状态,但是还没有足够能力代之以任何能起作用且较少专断的东西,真正的灾难就会降临。……有些意图良好的发展计划具有毁灭性的作用。”^③ 在社会资本的投资和提升中,存在重要的公共角色,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构建本身并不仅仅是私人问题,社会资本带有公共性,但是谁来担当公共角色,政府、社区还是自治而独立的民间组织,公共角色应当如何来担当,仍待进一步思考。

再次,社会资本投资的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问题。社会资本,很难通过外部干预而建立。政府过度的干预,不但没有增进福利而且会轻易摧毁农村早已存在的社会资本。如果政府过多地增进农村福利,会产生更多的依赖性公民而

① 文化滞后论认为,相互依赖的各种文化发生变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物质文化变迁先于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中,最先变迁的是制度,其次是风俗道德,最后是价值观。

② [美] A·奥斯特罗姆:《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曹荣湘编选《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4页。

③ [美] J·斯蒂格利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曹荣湘编选《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26页。

非开拓性公民，反而会减少创造社会资本的动力。因此，如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实现农村发展中所不可或缺的，然而，它并不是可由外部或自上而下的过程创造的速成形式。农村的发展，最终需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努力。但是，当前中国的农民在能力和机会上存在的困境，又绝非农民自身所能解决的，亟需外部环境的改善以及外部力量的介入。因此，在构建农村社会资本问题上，如何实现内外结合，各安其份，张弛有度，也是应予重点探讨的问题。

最后，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问题。在当今农民大规模流动，城乡分割空间布局已经被打破，但是制度上的二元治理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已经远远跨越“农村”这个狭隘的地域限制，已经成为全部国家范围内的社会资本分布问题。那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无疑对下层群体构成压制和掠夺，所以有的学者担心即使农民组织起来，但是因为自身的弱势地位，其社会资本总量与质量仍难与强势群体相抗衡。这种受压制群体社会资本规模越大，可能对社会危害越大。能不能允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进而与强势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均衡，消除社会资本的畸形分布，形成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叠共识”，防止群体间的暴力和冲突，无疑是当今政治体制改革所应解决的重点难题。

二、文献综述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农业大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传统文化中“耕战”“耕读”“民本”思想都把农业、农民问题放在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位置。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工业化西方国家的入侵，中国的有识之士把眼光转向西方，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工商业，农村问题受到忽视。以至于“1920年以前很少有作者关心中国的农业，也几乎没有写出关于农民的学术著作。”^① 20世纪20年代后关于乡村问题的学术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当时，由于外敌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乡村凋敝使中国现代化进程陷入空前危机之中。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

^① [美] 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推进了中国乡村建设研究和实践，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著名学者纷纷投入到对乡村建设和发展当中去，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措施。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也尝试在农村进行改革，实现三民主义“民生”信条。新生的而且不断壮大的共产党政权，在领导人中，特别是毛泽东所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等不但成为革命的经典文章，而且成为中国农村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西方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国际上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有人甚至拿这一时期农民研究领域取得的划时代进展与物理学领域中的牛顿定律相媲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相对宽松的环境，更吸引了一大批国外学者运用第一手资料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虽然，与国内学者相比，国外学者在价值观选择、研究方法、关注重点上存在诸多分歧，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彼此间的分歧正好可以提供给我们作为多样化学术研究的借鉴。具体来讲，国内外学者对政治现代化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社会资本

自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并列，当做配置资源和权力的实体，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以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热门概念和分析范式。

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研究是由布迪厄开始，将社会资本作为个人的“联系”，经由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再由帕特南将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与公共政策联系起来。社会资本概念也相应经历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每个学者都站在自身的学科角度，对社会资本的来源、构成、特征、功效、测量等加以定义。但是，目前所有的研究基本上都体现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学者们之间的争论也集中在使用社会资本层次间的差异。

1993年，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出版并被翻译引进后，国内学

术界对社会资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翻译、出版引进社会资本理论的著作不断涌现，相当一批学者尝试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学术论文。

中央编译局由于自身的职能定位，对国外相关学术热点问题比较敏感，对社会资本的翻译、介绍最早，研究成果最多。国内迄今为止出版翻译著作（论文集）有周红云主编的《社会资本与民主》，全书对国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分为社会资本的概念与争论、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社会资本与政治制度、社会资本与民主四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且，周红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资本的文章如《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等，出版了《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治理改革》《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等书籍。此外，曹荣湘选编的《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一书对国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概念争论、社会资本研究前沿领域以及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相关文章进行了汇总。此外，国内公开出版的有关社会资本研究著作有黄晓东的《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梁莹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成长》、卜长莉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等。

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学术杂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国外理论动态》陆续刊登了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翻译、研究的相关成果。与此同时，国内相关杂志也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马长山的《社会资本、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第3期；王尚银、康志亮的《中国熟人社会的“类社会资本”——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资本储量的考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边燕杰、王文彬、张磊、程诚的《跨体制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回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赵延东、洪岩璧的《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张凯兰的《培育社会资本：社会管理创新的非正式制度路径》，载《河北学刊》2012年第3期；吕涛的《社会资本的网络测量——关系、位置与资源》，载《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吴军、夏建中的《国外社会资本理论：历史脉络与前沿动态》，载《学术界》2012年第8期；杨肖锋、储小平、谢俊的《社会资本的心理来源：基于合作与竞争理论的分析》，载《软科学》2012年第3期；李石的《社会资

本：资本的理性扩展与走向》，载《哲学动态》2012年第7期等等，中国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和运用可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关于政治现代化

对于政治现代化研究，影响较大的是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亨廷顿认为二战以后，广大深受压迫、备尝艰辛和痛苦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事业获得的发展却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动荡不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政治发展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二者没有协调同步进行。实现政治现代化，是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保证。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权威的合理化、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参政扩大化。进而亨廷顿提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需要重点面对的两个难题。艾森斯塔德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通过分析现代化社会的特征和主要问题，对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进行研究，作者重点指出，必须产生一种能够容纳现代化进程各种社会变迁的结构，以及发现并形成这种结构的能力，是现代和现代化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艾森斯塔德根据能否形成这种制度化结构的能力，分析了现代化“崩溃”或者“倒退”情况。

孟军对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专著《寻求发展与稳定的平衡》，指出亨廷顿所提出的增强政治制度化水平，也即寻求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李元书在《政治发展导论》一书中，把政治现代化作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对其内容、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聂云麟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主要探讨了政治稳定在政治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以国家权力政治学为中心内容，用综合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人类社会从传统政治形态到现代政治形态发展的动力、过程和结果，解释了现代社会不同政治模式的特点和发生、发展的规律。

此外，关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相关学者发表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论文。较有代表性的有张华青的《论政治现代化与公民文化》，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史云贵的《中国政党“全能主义”治国模式及其政治现代化分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施雪华、孔凡义的《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载《探索》2006年第3期；丁栋虹的《中国政治现代

化的战略性演进——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李安增的《政治现代化研究——兼论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政治文明的关系》，载《理论学刊》2007年第9期；杨宏雨的《影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因素探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三）社会资本与农村治理

近年来，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勃兴，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分析框架结构解释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专著和论文。代表性著作有周红云的《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治理改革》、李金奇的《资本与地位：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社会学考察》、韦璞的《农村老年人社会资本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一个贫困社区老年人的生活状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社会资本与农村发展》、郑传贵的《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发展——以赣东项村为例》、马九杰的《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胡荣的《社会资本与地方治理》，等等。

公开出版的学术论文中，有关社会资本与农村发展的探讨俨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仅就2012年来讲，国内有影响力的一些学术杂志就发表了相当多的论文，如姚亮的《农村社会资本的嬗变与社会矛盾的消解》，载《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张伟明、刘艳君的《社会资本、嵌入与社会治理——来自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陈瑛、杨先明、周燕萍的《社会资本及其本地化程度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中国西部沿边地区的实证分析》，载《经济问题》2012年第11期；林善浪等的《社会资本、劳动权益保障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福建农村的问卷调查》，载《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11期；朱秋莲的《我国农民工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载《求索》2012年第11期；张学志、才国伟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珠三角调查数据的证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廖媛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对成员满意度的影响——以管理正规化程度为调节变量》，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5期；崔华华、刘信鹏的《社会资本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路径研究》，载《未来与发展》2012年第9期；童雪敏、晋洪涛、史清华的《农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载

《经济经纬》2012年第5期；黄江泉的《社会资本缺乏诱致下的中国农民贫困循环机理剖析》，载《经济学家》2012年第9期；包晓霞的《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基于400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等等。诸多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

（四）传统中国农村社会

研究农村现代化，不得不涉及到对传统农村社会的研究。现代就是传统的延续和延伸，传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脱离传统设想未来只可能将研究带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

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农村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历时之长，成果之多，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国学者本身。主要研究成果有美国来华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又译《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乡村生活》；哈佛学者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的思想与制度》，以及与麦克拉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以及由其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系列丛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李怀印的《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乡村中国纪事》，弗里曼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社会》；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黄树民《林村的故事》等等。

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其自身成长环境对于积贫积弱的农村社会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相关研究著作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刘泽华的《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内地农村》《江村经济》《皇权与绅权》等；秦晖的《传统十论》《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与金雁合作）；乔志强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罗平汉的《农村人民公社史》；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高王凌的《人民公社时期中国

农民反行为调查》；王铭铭的《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等。

（五）研究成果简评

总而言之，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遍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由于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决定了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政治作用，如亨廷顿所讲，农村在现代化的政治生活之中起着“左右大局”的关键作用。“农村奋起”的性质，亦即吸收农民参加政治体系的方式，能够决定今后的政治发展方向。农村作用是可变的，它既有可能成为稳定的来源，也可能成为革命的来源。来自农村的对抗是致命的。谁控制了农村，即等于控制了全国。^①近年以来，农村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左右大局”的作用，已经得到了政府高层以及广大专家学者、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从政策应对还是从对策研究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用于分析乡村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些研究成果为“三农”这个现代化进程中的跨世纪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和新颖的研究视角。

但是，纵观这些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政治现代化乃至社会资本研究起源于西方，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的今天，运用西方的分析工具解析中国社会现实，固然有使中国与国家社会接轨，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面，但是中国自有中国的国情，地理环境、自然资源、风俗习惯、人口分布、人际关系、社交规则、规章制度等与西方社会存在诸多的不同，一味沿用硬搬西方的概念，难免落入“为理论而解释”的尴尬处境，脱离社会现实，而且跟在西方话语权后亦步亦趋，丧失自身话语权；其二，有关中国农村研究中，多把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分析视角或者分析工具来解读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现象和农民行为，殊不知，如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一样，“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对象。“社会资本”概念在国外充满争论，还很不成熟，而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18页。

这正是研究的魅力所在。而且,“社会资本”概念同中国儒家思想“关系本位”、中国人重“面子”“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等社会人际交往规则极其贴近。尤其在农村,虽经历史变迁,人际交往中“社会资本”因素仍然至关重要,研究农村社会资本变迁及发展趋势是更好地了解与认识农村社会,服务新农村建设,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和谐的重要切入点。

三、研究方法

“方法是人类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使得自身获得发展与进步的功能活动的手段。”^①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科学研究中,选择一个正确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农村的历史很长,但是长期以来,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角。从长期统治封建社会、并且深入到民众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孔子的思想中可见一斑。《论语·子路》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中,统治者只要做到“礼、义、信”,就能实现大治,农事只不过是“小人”所从事的劳力活动而已,无需花费大的精力去研究。直到20世纪30、40年代,农民问题才引起了一批留学归国人士的关注,以乡村建设、乡村调研为主题的乡村研究盛极一时。但是此后四十多年,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农村研究长期中断,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研究才逐渐恢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农村研究的学理和方法论,逐渐向西方学习。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内向外”“从下往上”的方法转移过程,即从书本走向社会,从理论走向经验,从国家走向社会。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即是这种研究转变的尝试,也标志了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大批专业学术机构对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个案

^① 刘蔚华主编:《方法论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调查，出版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分量的调研成果。但是就当前学术界使用的研究方法来讲，存在以下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①

1. 只见“社会”，不见国家。将“社会”引入研究视角，发现长期被国家所遮蔽的社会，寻求社会的自主性，固然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国家日益深入到社会领域的情况下，国家的影子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没有社会就没有国家，同样没有国家就没有社会。因此，要从“发现社会”走向“回归国家”。

2.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重视实地经验，重视个案研究，以事实说话，比纸上谈兵的空谈具有难以比拟的学术优势。但是，极易出现个别经验轻率得出一般结论“致命的自负”。而且在当前个案研究中，很少有学者从大量个案调查中提炼观点，构建理论模型，形成分析框架，有的只是大量个案经验的堆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却不知所云。

3. 只见“描述”，不见“解释”。注重事实、以事实说话对于中国农村研究十分重要。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中国学者出现了自我封闭理论关怀、理论提炼大门的倾向，侧重“是什么”，忽视“为什么”。缺少理论关怀，无法对事实进行必要的解释。

4. 只见“传统”，不见“走向”。自下而上的研究十分重视传统，以过去推断今后的走向，中国社会变迁的终极力量来自于自身的发展历史。尊重传统经验是必要的。但是，将农村社会存在和发生的各种消极现象都归之于现代化，现代化是农村的“天然敌人”，没有看到传统与现代之间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从而人为割裂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本论著力图融合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本土与国际、理论与实证之间的割裂与对立，将“内外”“上下”“中西”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本论著主要采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 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法。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 也就是说，现实的人们要

① 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反思》，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第55—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3页。